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的历史经验

沈学珩

(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科学系,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在山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山西特色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党能够利用这些合法组织,不断壮大抗日革命力量,争取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进步势力,开创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

关键词:抗日战争;山西;国共合作

中图分类号:K2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3X(2005)03-0034-04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成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从抗战初期,到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之前,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都实行了比较密切的合作,是抗战史上国共两党关系最融洽的时期。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合作为基础的。在抗战八年中,国共两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密切配合,取得了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平型关大捷;组织了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会战——忻口战役;建立了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开创了山西抗战的特殊局面。个中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锐利武器,并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经验。

式开展工作,发展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使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地发展壮大,并始终保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山西是中国华北地区抗战的重点,是八路军走向华北抗日前线的前哨和通道。八路军主力于1937年9月挺进山西,就进入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地盘。中国共产党认为,八路军赴山西是扭转华北危机,支持华北抗战的决定性因素。山西省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近邻,是红军北上抗日的必经之地。阎锡山身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要职,又具有相当的实力,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争取对象。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要和各党派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除争取国民党中的爱国领袖、将领外,把争取地方实力派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山西的阎锡山极为重视。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的成功之处,在于建立了具有山西特色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利用统一战线这一合法的组织、合法的形

阎锡山是一个具有多种政治色彩的地方实力派,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与自私性,他既坚决反共,又不喜欢蒋介石,更不喜欢日本帝国主义。华北事变后,阎锡山处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国共产党的矛盾中,日本的侵略势力扩大到阎锡山的管辖地段察、绥,直逼山西,投资总额为一亿五千多万元的

35个厂矿企业和刚刚修建的同蒲铁路将要毁于一旦,阎锡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激化;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也在激化,他对蒋介石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与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分庭抗礼,在红军东征回师后,援晋蒋军一直滞留山西,蒋想借剿共之名把阎锡山吃掉,对阎形成最大的威胁;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声明“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1](P.180)},要求阎锡山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反蒋。阎锡山一怕亡于共,二怕亡于蒋,更怕亡于日,考虑到共产党目前不是他最大的威胁,真正的危险来自蒋介石和日本,他想利用共产党来发展他的力量和巩固他的统治,便开始倾向抗日,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进行合作。1936年11月2日,彭雪枫进驻太原与阎谈判。中国共产党以捐弃前嫌,团结御侮的民族大义为重,真诚与阎锡山合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多方争取,阎锡山终于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阎向中共代表表示:自今日始,你们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活动。至此,以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合作为基础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2](P.292)}。阎锡山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接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抗战初期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形式——牺牲救国同盟会。它的原名叫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表示,“抗日救国”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我们不能用,因为它对日本人刺激太大,会惹出祸来,所以,他就把“抗日救国”改成“牺牲救国”。这样,以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为宗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于1936年9月18日正式成立。由当时在太原工作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杜任之、宋劭文、张文昂、刘玉衡、牛佩琮等发起,经阎锡山批准,阎自任会长。牺盟会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与阎锡山联合抗日的群众性组织。1936年10月底,薄一波等61名共产党员从北平出狱。阎锡山闻讯后派人去北平邀请薄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后立即前往山西,奉党的指示到山西主持牺盟会的工作,充分利用阎锡山这一公开、合法的官办团体,秘密发展党的力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发展进步势力。薄一波在征得阎的同意后,对其进行了改组,充实了领导班子,会长还是阎锡山,7名常委中,6人是共产党员,阎的亲信、特务头子梁化之任总干事,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改组后的牺盟会虽然戴着山

西的“帽子”,打着阎锡山的“招牌”,是“官办”、“合法”的抗日联盟的组织形式,而实质上,牺盟会的领导完全掌握在我党手里。改组后的牺盟会是我党直接领导、发展、壮大起来的革命组织,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起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团结了许多青年学生和干部,并在全省各县都建立了组织。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公开工作委员会在大力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以“牺盟会”为核心,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救亡团体,大批培训干部,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牺盟会的发展非常迅速,1937年底,牺盟会召开了300余人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时该会会员已发展到几十万,创建了105个县分会和若干中心区,培养了2万以上的政治干部和武装干部。在日军进攻中,山西大部分旧政权陷于瘫痪,县政权一个个垮台,成批的牺盟会会员出任游击县长,掌握了县政权。新县长到职后,巩固扩大游击区,打击汉奸活动,摧毁敌伪组织,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青、妇救国会和儿童团,推行减租减息,动员农民参军、参战,组织游击队、自卫队,在山西省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与日、伪浴血奋战,并认真执行和实施战时财经政策,实行抗日教育,很快就各阶层人民团结在县政府周围,对稳定山西战局起了显著作用。据统计,以牺盟会会员身份出现由共产党员担任县长的在山西全省105个县中就有62个县,他们发展当地的党组织,为八路军提供给养。牺盟会为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进入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抗战初期牺盟会在山西掌握这么多的政权,对八路军人力、物力的支援,对山西和华北的抗战,对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几个根据地的建设,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双方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党有中央军和地方的军阀部队,共产党有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根据地的游击队。国共两党没有共同掌握的抗日武装,但在山西,我党和阎锡山除了各自有自己的军队以外,还有共同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阎锡山曾经说过:“东北失守,张学良退出东北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假如日本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最终怎么办?如果能坚持抗战,日本人总会离开的,旧军人靠不住,必须组织一支新的抵抗力量。”^{[3](P.27)}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损失惨重,要支撑山西的

抗战局面,必须组建新的军队。薄一波同志等根据我党的组织民众、武装抗日的号召,从山西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阎锡山在日寇进逼下想组建一支军队的愿望,向阎提出组建新军,改革旧军的创意。在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后,相继组织成立了山西国民军官教导团、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山西少年抗敌决死队、山西少年抗敌先锋队。1937年8月1日,第一支新式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正式成立。新军广义地讲应包括决死队、政卫旅、工卫旅、暂一师等。但一般而言,新军主要是指决死队,到1939年底,山西新军已由决死队4个总队发展到50个正规团,约6万多人,加上近百个县、区的自卫队、游击队兵力约10万人左右。由于我党的努力,国民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就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在新军中普遍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并用我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思想来教育和武装它,所以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八年抗战中,新军共作战7000余次,歼敌5万多人。他们在配合八路军作战,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坚持山西抗战的主力之一。而八路军的三支部队与当地中共组织和牺盟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人民武装相结合,实行了全面抗战的路线,执行了中共中央所规定的“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这对全国的抗战起了巨大的鼓舞、促进和推动作用,更使山西的抗战形势起了决定性的变化。

二

国共两党在山西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争取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进步势力和中间力量,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原则,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有组织、有纲领的统一战线组织。

统一战线一个重要的策略方针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统一战线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抗战初期,党内还有一种“左”倾关门主义的思想情绪,就全国范围来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和统一的组织形式,双方只能采取遇事协商、临时约见的方法,这就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但在山西,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却建立了双方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

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战动总会是有组织、有纲领的双方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1937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阎锡山谈判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与作战任务时,同阎商定在第二战区所辖晋、察、绥三省范围内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周恩来领导起草动委会工作纲领,经阎修改批准,其主要内容有:积极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实行减租减息、救济失业的灾民,免除过去一切摊派,剔除中饱等。9月20日,战动总会在太原正式成立。战动总会委员会由阎锡山一方和共产党一方各派代表若干名,山西、察哈尔、绥远三省省政府各派代表一名,牺盟会、公道团、学联、教联等民众团体各派代表一名,共21人组成,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杨集贤(国民党员)任副主任委员,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人有:武装部长陈子华,组织部长南汉宸,动员分配部副部长武新宇^{[4](P.327)}。当时在山西进行抗日活动的救国会“七君子”的李公朴任宣传部长(未到职)。战动总会由省到县、区,一直到街道和村,有完整、健全的组织系统,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群众抗日的最强有力的统战机构,而且是一个具有相当权利的行政机构。战动总会还规定了它的任务在宣传抗日,组织、武装群众,培养干部,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巩固抗日政权等方面的大量工作。

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只有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才能抵御强敌、争取胜利。全面抗战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抗日时期的具体体现。1937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指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需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必须如此,才能适应抗日战争。”^{[5](P.353)}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而抗战初期,我党在山西与

阎锡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一个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即1937年11月6日公布的《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后,认真地研究了山西的实际情况,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特别是山西的特点,为了减少阎的顾虑,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修改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不利于团结阎统治集团的条文和词句,用了一些阎锡山惯用的政治术语,起草了《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是山西地区的抗战纲领,是我党同阎锡山所建立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纲领由牺盟会、公道团、军政训练委员会共同提出,经阎锡山同意,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公布执行。这个纲领的制定和公布,对抗战初期山西抗战形势的发展,曾起了重大作用。山西的国共合作,充分显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争取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进步势力和中间力量,建立了全国唯一的、名副其实的、有组织、有纲领的统一战线组织。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级统战组织,戴的都是阎锡山的帽子,如牺盟会、决死队、战委会等等,均由阎锡山主办,场所和经费由阎提供,但它们却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当时阎锡山有他自己的一套口号和用语,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亡”,他就叫“抗敌救亡”;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就叫“动员民众,守土抗战”;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就叫“抗敌救亡统一战线”,稍后又叫“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阎锡山正是通过这些来表现他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他认为这就是属于他的、属于山西的东西,就比较放心,可以开绿灯,否则,一切都行不通^[3](P.45)]。所谓的“保晋大业”,即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如果简单地把革命口号和政治术语硬搬过来,必将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薄一波曾说:“我们也知道,阎锡山不会根本改变他对共产党的立场,他不会同我们真正走一条路,同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走到一起的短暂同盟。我们也正是在合法斗争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救亡运动,双方信心都很大,关键就看形势的发展和策略的运用了。”^[6](P.145)]中共的公开工作委员会有鉴于此,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当时在共产党内流行三句话:戴阎锡山的帽子,讲“山西的话”,

“旧瓶装新酒”。毛泽东曾对薄一波称赞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一个成功的例子。”^[7]在八年抗战中,山西之所以能成为坚持敌后抗战与正面战场相配合的前哨阵地,成为八路军创建华北三大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依托,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成功地进行了合作。

抗战初期,国共在山西合作的时间上是先于全国的,并建立了两个共产党领导的不同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策略创造性地与山西的实际结合起来的成果。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1939年底,阎锡山追随蒋介石发动“十二月事变”。中国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阎锡山顽军以坚决反击,从争取团结阎抗日的愿望出发,向阎提出恢复联合抗日。由于我党的努力,使得我党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2] 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 阎锡山评传[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3] 牺盟会和决死队编写组. 牺盟会和决死队[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4] 张铁男, 宋春. 国共两党历史与现状研究[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 [6] 黄修荣.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7] 薄一波. 崇敬与怀念——献给党诞生六十周年[N]. 人民日报, 1981-07-03.



作者简介:沈学珩(1969-),女,江苏射阳人。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革命史。